

岁岁金河复玉关

读《黄河好人》有感

马旭舟

浊流宛转，九曲连环，是自冰川万丈的巴彦喀拉山北麓起势、兼纳千溪百川、蜿蜒盘旋于祖国北疆大地的金色巨龙。

于是有了这样一群人——三十载斗转星移，他们与一部望远镜、一艘小皮艇和五公里长的黄河堤坝为伴，为生命泛舟、护航。

翻开水孩儿所著《黄河好人》，如真临滔滔江水，真见生死险关，真与这群黄河英雄相对而坐，听他们笑着说：“是的，我们都叫好人王三。”

《黄河好人》的故事开始于2019年秋，诞生于在那片拥有“黄白色的苇草、猩红色的植被、大片的向日葵和玉米地”的黄河畔。

烧过的枯树”之浓厚秋景的黄河畔。“好人王三”——或者说，“好人王三们”，就是打捞荒芜的“摆渡人”。

出生在黄河北岸的王三自幼就在黄河畔耍水。黄河之水养育着画匠营子村的乡亲们，而朴实善良的他们虽穷苦，却以自己的方式反哺着母亲河——在这里，几乎人人都有过救人的经历。

也有许多人以最华丽的辞藻夸耀着王三和救援队员的无私和伟大，但他们总是摆摆手推辞着美名：“这只是我们应该做的。谁遇到这种事都会帮忙的。”

即使默默付出不求回报，他们的光辉也将永远闪耀于奔涌不息的黄河水，被更多人流传、歌颂。因为那些拼尽全力的呐喊，黄河听得见，人们都听得见。

2013年，在政府支持下，王三成立了王三黄河水上救援志愿服务队，并于2013年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无关聚光灯与摄像机，他们总是游离于浮华之外。多少次在寒冷刺骨的河中挣扎沉浮，却始终不肯放开伸向生命之岸的那双手；多少次被苛责、误解，却始终不曾搁置炙热又单纯的救人之心；多少次在重重恶意和艰难之下感慨“生活真难”，却终究笑着说：“社会上还是好人多，希望整个社会越来越好。”

这世上总是“一山放下一山拦”，经历了“山重水复”却难见“柳暗花明”，所以很多人人心灰意冷。他们想要结束行尸走肉、痛苦不堪的一切，欲投入冰冷河底再不受人世烦扰。可没想到悲恸与窒息的尽头，却出现了王三千燥而有力的手掌。他把他们拉上岸，也唤醒他们本已枯死的心。

王三只是一个平凡的农民，他并不善于言辞，甚至不怎么会说普通话。这么多年来，他唯一会的普通话只是用于警示的：“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尽快离开冰面”。但他和无数个“他们”却救无数人于冰间水火，他们比医术高明的神医更悬壶济世，比翻云覆雨的神明更神通广大。

合上书页，内心的震撼亦久久难以消散。与曾去过王三鱼馆的友人相谈，他说：“看到自己记忆中曾敬仰的人物被写进书，惊讶中带着感动。如今时代，能把文笔着眼于普通人的创作者少之又少，令人敬佩。”

是啊，正如文中救援队员对作者水孩儿所说：“我们是救人，而你们作家是救心。”四年的采访创作，最终用汗水与心血凝结成丰富的采访经历和详实的文字记载。是她将如此壮丽的黄河与如此壮丽的人性尽数挥洒入笔墨，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和民生的关怀，将黄河畔的故事永恒定格，并努力讲给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这才知道——原来黄河边还有这样一群人，原来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仍有这样朴素的真心，原来社会上还有这么多值得关注的特殊群体——因为情感问题而轻易放弃生命的失恋男女、身不由己的抑郁症患者、无人问津的孤寡老人……原来还有这么多值得深思的焦点问题……

如此种种，皆予人以重重锤击。没有虚无的言语堆砌，没有假大空的独白与口号，客观详尽的刻画、生动鲜活的语言、深邃辽远的思考，组成这样打动和改变了无数人的珍贵文学作品。而这或许才是当代文学创作者应该肩负的责任与良知——文学绝不应只是茶余饭后的享乐快餐，它应是包裹着大千世界真实影像的明慧之笔，是倾诉与传递爱与真情的有温度的媒介，是真正触及人内心深处柔软地带的一汪清泉。

《黄河好人》和水孩儿无疑淋漓尽致地承担了如此的宏伟职责，在呼吁更多人关注“好人王三”之社会大爱的同时，也呼吁更多创作者心怀悲悯、执笔现实，为现实发声。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守，何尝不是一种如黄河般广阔深远的、又何尝不是一种“岁岁金河复玉关”！

（作者为内蒙古大学在读学生）

文艺评论

对黄河的文化寻根

——新中国黄河题材美术创作系列评论(二)

■王鹏瑞

黄河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发祥地，中华文明的摇篮。它不但养育了炎黄子孙，创造了悠久历史，而且积淀了深厚的文化传统。黄河文化作为一种大河文明，有其鲜明的特色，它是黄河流域先民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与突出代表，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黄河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来，美术工作者没有满足于对黄河的表面再现和对黄河象征意义的表达，还有一些画家和作品，体现出对古老而深厚的黄河文化的深切追寻。

在对黄河的文化寻根方面，体现出更加自觉行动和主观激情的是画家周韶华和段正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周韶华先后四次的“黄河万里行”拉开了他面对黄河文明的文化寻根，并于1983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大河寻源——周韶华画展”，引起美术界热烈反响。

作为画家周韶华和段正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周韶华先后四次的“黄河万里行”拉开了他面对黄河文明的文化寻根，并于1983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大河寻源——周韶华画展”，引起美术界热烈反响。周韶华的“大河寻源”系列作品，以其恢弘的民族气韵、对黄河文明的

体，呈现出一种非常主观化的处理、主观化的表现，如《黄土高原的母亲》将一位怀抱小孩的母亲形象与背后的黄土高原作为一个整体来描绘，去除了三维空间、立体表现和真实色彩，形象而又深刻地揭示了“黄土高原的母亲”与黄土高原的关系，从而使作品主题得以升华。

与上述画家和作品不同，还有一些作品是通过直接对黄河或黄土高原自然景观的描绘来进行文化寻根的。谢瑞阶的中国画《大河上下 浩浩长存》通过跌宕的构图，磅礴的气势和深厚的传统功夫表现了“大河上下，浩浩长存”的意境，体现了对母亲

河的文化追寻和美好寓意。张凭的中国画《黄河》则是通过对满幅的黄河瀑布的描绘来体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意境和黄河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卢禹舜的中国画《黄河安澜》在对黄河进行文化追寻的同时，寄寓了“黄河安澜”的美好愿景。

对黄河的文化追寻，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追寻，它为现代中国召唤传统之魂，使今天的人们在走向现代、走向未来的时候回望和思考，其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



《黄河》安正中作

分享悦读

星光不问赶路人

——读韩伟林散文集《同月之光》

●冯永平 殷福军

史人物，掀开了曾被遮掩的历史面纱，又在新的重构和再次对话的过程中，在不同民族相互学习互相打造的大环境下，彰显出蕴涵家国情怀、人文关怀的历史文学价值。

作为作家周韶华和段正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周韶华先后四次的“黄河万里行”拉开了他面对黄河文明的文化寻根，并于1983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大河寻源——周韶华画展”，引起美术界热烈反响。

韩伟林老师在《同月之光》中写道：“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很多能够帮助说明现在。对于作家，写历史其实是写思考，写心有感悟，写汲取的精神营养。”

对于作家，写历史其实是写思考，写心有感悟，写汲取的精神营养。对于《同月之光》这本书的目标，韩伟林老师也在该书后记中有了说明，他说：“……按千年时间顺序进行的跨度深广的文学抒写，这是我的全新尝试，也是试图达到的独具特色之处。我希望这是这个民族的文学的简史。”

风格一：视角的专业化。《同月之光》中，作者采用了单刀直入冷静客观的平视法和尽收眼底了然于胸的俯视法，从社会科学、草原科学等多个特定的专业方向出发，以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察，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趋势的广阔与

多元一体的视角，站在历史文化哲学的层面上，对历史进程作出了含有多学科性质的阐释。这样不但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容量，增加了可信度和亲和力，也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穿透力和传播力，达到了人与自然、文字与历史相互凝视、互相成全的良好效果。

风格二：时空的一体化。《同月之光》一书中，韩伟林老师在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征的“时空一体化”观念引导下，从春营盘、夏营盘、“转场”到秋营盘、冬营盘；从鸡儿年、鼠儿年，“纪年”到虎儿年、羊儿年……在与时空对视的框架里，把对时空性的繁杂了解与深入的思考结合起来，对历史演进的逻辑合理展开分析、比拟、探究、论述。对读者来说，《同月之光》就是一次跨时空的“对话”，更是穿越时空的“相识之光”。

风格三：叙事的故事化。《同月之光》里作者用散文的手法 and 情致深婉的微观体悟，在想象、陈述过往的层次上，在解决认知与矛盾的起伏间展开史料丰富、考证严谨、干净利落的叙事，以质朴平实赋予了诗意的故事性和细节还原历史的景象，摸索出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范例、新经验。换个角度说，《同月之光》像一部多幕剧，生动鲜活丰厚而极具纵深感。它又像一部会说话、有感情的信物，其中饱含着人们对自然对历史的一往情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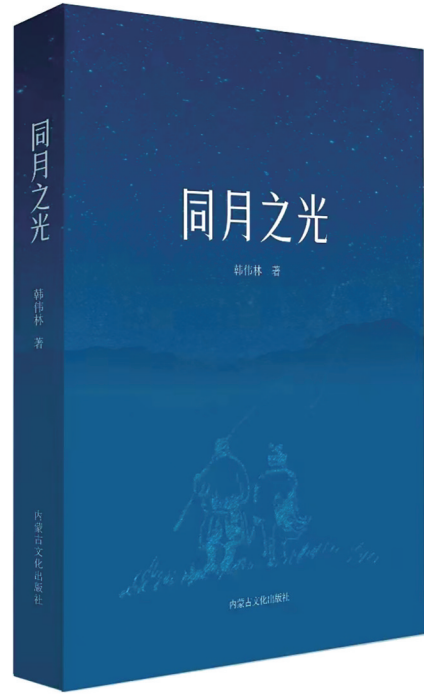
慢慢品读该书，过往回忆和现场感并重，历史与审美天然融合，传说与现实自然相遇，众多的知识融化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使历史更显魅力，使审美更具深度”，这显示了韩伟林老师不凡的文笔功力和“控事”能力。单从这点来说，这本书就值得被更多人知晓。

《同月之光》中，自我拷问、追问与质询，是韩伟林老师自始至终书写的主调。他在思想资源和精神修养垫衬的基础上，凭着思考者的身份，往返古今，吞吐时光，与历史人物对晤，给予了包括历史在内的部分中华历史较完整的巡视和检视。走进《同月之光》，韩伟林老师正视

过往与当下，凭借着深沉历史风物，和对历史的洞彻与思虑之感，来寻觅中华、寻根问祖、寻求文化心灵和人生真谛，实现了对思想文化的反省构建，和对精神灵魂的淬炼洗礼，畅达深奥中涌动着激情与灵性的智慧。总体来讲，读过《同月之光》，你会真切感觉，《同月之光》实际上就是一个“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过程，一个在追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过程。

关于《同月之光》的意义，在笔者看来归纳有两点：一是找到了民族历史题材散文创作的“守正之道”。写历史上的民族，如何在文字间展示民族融合和文明进步？中华各民族发展历程中，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贡献对各自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作用乃至是民族文化基因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是作家必须正视的。韩伟林老师做到了这一点，于是便有了揭开历史一角的《同月之光》浓墨重彩地展现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脉络走向的壮景。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在该书序中写道：《同月之光》这本书的意义何在？我觉得作者是在表达自己对民族历史的理解，并从对历史的解读中去触摸民族的根脉；二是找到了民族历史题材散文创作的“创新之路”。《同月之光》在从过去发现未来的过程中，秉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文学化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其绵延千年自身持续发展的保证，这一点在世界格局中“交流互鉴、共生共荣”的当今格局中尤为重要。

《同月之光》中，自我拷问、追问与质询，是韩伟林老师自始至终书写的主调。他在思想资源和精神修养垫衬的基础上，凭着思考者的身份，往返古今，吞吐时光，与历史人物对晤，给予了包括历史在内的部分中华历史较完整的巡视和检视。走进《同月之光》，韩伟林老师正视



同月之光